

K877.402
20112
4

閱覽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三晋石刻大全

●晋中市左权县卷

主编 王兵



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晋石刻大全. 晋中市左权县卷 / 李玉明主编 —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457-0216-3

I. 三… II. 李… III. 石刻 - 左权县 - 图录 IV.
K877.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2252号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本卷主编: 王 兵

责任编辑: 朱 屹

助理编辑: 任俊芳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8

印 张: 64

字 数: 40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 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216-3

定 价: 38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78-7-5457-0216-3



9 787545 702163 >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薛延忠 申维辰 申联彬 高建民 胡苏平
张 平 李立功 王庭栋 郭裕怀 白清才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刘 江 张 颌

主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张国祥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伟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储仲君 郭双威 赵华山
梁俊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齐荣晋
李 尧 李 非 李小强 吴广隆 张鸿仁
陈长禄 高 可 崔正森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主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张继红 落馥香

审 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编纂督导组

顾问：李永宏 张 璞
主任：刘志宏 李年善

执行主任：杨二怀

成员：温毓诚 张定邦 王敏政 张晋平 李文艺
周丽萍 晋 华 郭绍华 武志远 阴崇民
郭润生 王俊山 武增亮 葛凤英 李文端

编 审：张晋平 晋 华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编委会

主 编：王 兵

执行主编：李左红 冯耀武

委 员：张世华 李宝虎 张 峰 赵瑞中 刘伏生 姜 杉

编 审：冯耀武 姜 杉 王晨霞 曹红亮

拓 印：曹红亮

碑文抄录：王晨霞 曹红亮

拓本拍照：姜 杉 曹红亮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新中国成立前后凡在《三晋石刻总目》中存目并补充遗漏和新发现的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布施碑，根据历史、文化价值并有助于当地古代史和革命史研究的原则，慎重选择收录。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和墓志铭，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一般分三大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与附录。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篇内容一般包括石刻名称(全称)、简介、石刻录文(全文录入并断句)。元代(含元代)以上的石刻每通(件)配黑白照片或拓片若干张(全景和特写)，明清以后石刻遴选重要者配拓片和照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在“简介”中首先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然后再简介石刻。

八、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九、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十、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一、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

(627)。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1949年10月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二、碑刻规格单位,用厘米。如长(或高)120、宽60、高80厘米,长、宽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又如高120、宽60厘米,高也不加“厘米”。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主要是为了保存史料的真实性。其余均使用规范汉字。

十四、每卷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等,保持原貌,一般不作甄别。

十五、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括注“下阙”。

十六、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检索,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轘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首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赑屃)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卣》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寃、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的原

因(如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碑碣、墓志铭等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最多时究竟有多少石刻,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组织,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摭,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补遗拾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的特点是不能再生性,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法,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的《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之碑刻,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加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省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原晋中市人大副主任 杨二怀

“盛世修志,盛事勒石”,极言修志刻石之至要也。修志即纪史,史可鉴古知今,晓谕后人,但由于历代史官自身的局限性或某些客观原因,使有的史书中许多记载史料不实、不全,甚至存在明显的差错。一旦形成定论,以讹传讹,贻害无穷。唯同一时期的石刻、碑碣等,由于其内容涉及面相当广泛,几乎囊括各个层面的各种社会状况,且秉笔直书,史料翔实,可以证史之真伪,补史之不足,进而纠正史书之舛误。历史上通过碑碣、墓志等刻石取得佐证,澄清史实,进而辨别真伪及疑案、悬案的事例,比比皆是。由是,访求石刻成为许多史学家、方志学家和文化学者的终身爱好,历来为有识者所重视。

晋中市地处三晋腹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文化底蕴极其深厚。境内文物古迹众多,各类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仅就石刻而言,不仅门类齐全,而且跨越时间长,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晋中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在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指导下,已陆续编纂了《晋中碑刻选粹》和《三晋石刻总目·晋中市卷》。前者辑录选拓上自北魏下迄民国的各种碑刻共计463通,乃晋中碑刻之精粹;后者收录与前者同一时期各类石刻目录计2474条(晋中市现存碑刻总量约在3000通以上)。虽不敢言已悉数收录和发掘,但其不失为一笔宝贵财富,对挖掘、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晋中”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些石刻、碑帖中,不乏珍品佳作,其中有些在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如明洪武年间的《新修十八盘并天井郊城堡图碑》、明万历年间三彩琉璃烧造的《空王佛行宫碑记》和《空王殿建修碑》,唐代的《汾州抱腹寺碑》、《李光进神道碑铭并序》和《李光颜神道碑铭并序》等。此外,还有许多碑帖都是书法艺术价值极高的稀世珍品,如清初傅山隶书《郭泰碑》、清中期祁寓藻行书《祁氏支祠碑》、民国时赵铁山楷书《太谷重修大观楼记碑》、常旭春楷书《朱子治家格言刻石》等。尽管如此,由于条件所限,仍有大量有价值的碑刻未被采掇,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所喜者,近年来由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各县(市、区)分别遴选的一批精粹石刻,已陆续编录出版。

在此基础上,左权县有志于此的同志们继续整理和研究金石碑刻,从收录、拓印、点校到编辑成书,他们几经寒暑,甘守寂寞,淡泊名利,不遗余力,终于按照三晋文化研究会《三晋石刻大全》之要求,编纂成《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其中甘苦,非亲历者不能察也。其精神令人钦佩,感铭至深!古语云:“有志者,事竟成。”信哉斯言!

谨此数语,聊以为序。

序 二

中共左权县委书记 王 兵
左权县人民政府县长

左权县,古为三晋边境重镇之辽州直隶州。传说4000多年前,华夏民族始祖五帝之一的颡顼之子重黎,誉称祝融,因功而获封此地,始筑辽阳城。唐尧属冀,虞舜属并州,春秋归晋,秦汉后属于上党郡,东汉延康元年(220)置辽河县。隋开皇六年(586)置州,辖辽山、和顺、榆社诸县,明洪武元年(1368)升辽州为直隶州。州治于斯,百业兴盛。在千余年社会周而复始的不断裂变与重新组合中,虽州名、辖区时有更迭,而州级建置存续达1300余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50多个党政军学商机关单位在这里驻扎五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汇集于此,运筹帷幄,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日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这里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华北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1942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于麻田十字岭壮烈殉国,辽县因此易名为左权县。辽州大地从此耸立起一座浩气长存的不朽丰碑。

左权县经历过千余年的历史变迁之后,地下地上积淀了颇为丰富的文物古迹,如春秋时期的先轸墓,两晋时期的石佛寺,东魏的高欢云洞等等。除此之外,彰显我军民为民族独立解放英勇奋斗的革命遗迹更是遍及县境。全县拥有各类文物保护单位300余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8处。在众多文物遗迹中,碑碣由于兼具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而成为传统文化长河中独具魅力的一条支流,对于“存史、资治、教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古老的左权大地上,自周秦以来,碑碣石刻遗存众多,或竖于庙堂,或立于荒野,或凿于石壁,各具魅力,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然而,长期以来,我县碑碣石刻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涉足者寥寥,文化瑰宝,蒙尘染垢,可惜可叹。

借《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启动之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担纲,文物部门同志艰辛努力,经年余之力,对境内数百碑碣刻石精心梳理、释疑问难、辨伪存真。《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初告集成,即将付梓。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收录境内上起北魏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类石刻350条,所载民物风俗,栩栩如生,所记公私史事,自成篇章。读者在对碑碣的书法艺术进行研究、欣赏的同时,也可进而对其历史价值、社会功能、文化内涵等进行全面深入研究。《三晋石刻大全》将左权碑刻文化置于数千年中国特别是三晋地区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从单一到综合,从微观到宏观,从零散到系统,从表象到内涵,从历史到现实,对碑的政治、历史、宗教、社会、吏治、教育、科举、地理、建筑、书法艺术、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考证、剖析,对于解读“三晋文化”独特的文化类型,揭示左权县特有的文化特色、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弥补地方文献之缺略,加强左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促进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建设文化大县,打造人文左权,都具有重要意义。

盛世修典,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是一部融丰富史料与书法艺术为一体的地方金石志,它的出版,填补了左权历史文化的一项空白,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带有文字的文物,碑碣石刻记录了历史更迭与时代变迁,但现存碑刻历史久远,再加自然的侵蚀和人为破坏,正面临消失的危机。愿更多有识之士涉足到碑碣石刻等左权地方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之中,以古鉴今,古为今用。

是为序。

概述

左权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古为辽州、辽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各个历史时期遗存的碑碣石刻就达300余通(处)之多,成为左权地方传统文化长河中独具魅力的一条支流。

碑碣石刻,集记史、纪事、文字、文学、测图、绘画、纹饰、书法、选石、摹勒、镌刻、雕凿等于一体,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是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珍贵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来人民群众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研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民俗、艺术、科技等的珍贵、翔实的资料。

全县现存碑碣石刻,已经登记入档者计370通,其中包括佚失碑20通。

这些碑刻,遍布全县境内。从形制可分为以下几类:碑(含造像碑、墓表)现存318通;碣(刻石)24方;墓志与墓志铭3方(盒);摩崖题记1处;匾额2件;其他石刻(石刻对联、达摩祖师像)2块,总计350通。

传拓收藏的350余通碑碣石刻中,纪年最早的为1989年在县城花园路东段出土的北魏(386—534)时期的《北魏造像碑》,现存于县文物局,国家一级文物。北魏正光六年(525)雕造。碑额圆首。碑通高123、宽70、厚11厘米。碑上部居中辟尖拱楣状龕,龕内浮雕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两侧浮雕站立肋侍菩萨。其余部分辟尖拱楣状龕,龕内浮雕结跏趺坐佛像,共30尊。碑红砂岩石石质,品相完整。其余碑刻纪年时代依次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以来。

现存的唐代碑碣有1998年在县国税局办公楼建设工地出土的唐天宝五年(746)的《大唐乐平郡张君墓志铭并序》,现存于县文物局。盖呈盂顶形,边长45厘米、厚8厘米;志呈正方形。盖篆书“张君墓志”,志文楷书,15行,满行15字,共211字。墓志铭红砂石石质。品相完整,字迹基本清晰。志文为左权县的建置沿革提供了实证资料。志文中“……东望佳城,丁令遗迹;西瞻马廐,赵俗仍存。南控辽川,禹切因感”的记述,对左权县县城在隋唐时期的迁徙提供了有力佐证。

宋元祐三年(1088)的《宋赵公墓志铭》,2004年出土于县万寿住宅小区。现存于县文物局。盖呈盂顶形,边长73厘米,厚19厘米。盖竖书篆书“宋故供备赵公墓志铭”。志呈正方形,边长73厘米,厚19厘米。志文楷书,37行,满行37字,共1252字。新授唐州司户参军王临撰文,新授岚州司理参军张希杰书丹,新授石州定胡县尉兼主簿武经篆盖。石匠清河张恩刻石。志文记载了宋高祖嫡系子孙赵武,为供备库副使银青光禄大夫,虽系太原阳曲人氏,因爱辽州(今左权)风俗淳古、土物丰阜,故死后特葬于此。墓志铭青石石质,品相完整,字迹清晰,为国家一级文物。

元代的碑碣有3通。分别为:现存于辽阳镇庙沟村昭懿圣母庙,元元统二年(1334)的《崞山昭懿圣母庙记》;现存于桐峪镇桐滩村管帽山,元至正四年(1344)的《古箕许氏创修莹原记》;现存于县文物局,元至正九年(1341)的《重修儒学宫记碑》等。这些碑品相基本完整,碑面风化较为严重,字迹基本清晰。

明代碑碣存量较多,达60余通。在众多碑碣中,极具考古价值的有全国保留至今唯一一通完好的明长城内城堡图碑——《新修十八盘并天井郊城堡图碑》。碑现存于羊角乡盘垱村黄泽关。明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立石。据黄泽关所立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辽州黄泽关重修义勇武安王庙碑》所载:“缘自我太祖高皇帝藩封恭王入晋,钦命行军大司马高巍火暖崇岗,林石焚爆,开山凿路,上筑堡寨,内设弓兵巡检司。”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在全国丈量土地并绘制图形,实行里甲制和关津制。规定在全国“冲要去处”,分设巡检司盘查行人。十八盘为山西通往河北的关隘要冲,《城堡图》详细描绘了黄泽关关堡及关门和关道的位置、格局,是长城沿线唯一记载关堡布局的石碑,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研究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专题片《望长城》曾予以专门介绍。

清代碑碣现存 150 余通。价值较高的有现存于左权县羊角乡羊角村的清光绪八年（1882）《告示碑》。碑分阴阳两面，碑额圆首，碑座遗失，碑通高 105、宽 54、厚 16 厘米。碑阳面，额篆书“守兹勿弃”。碑文楷书，12 行，满行 30 字，共 263 字。碑阴面，额篆书“用垂永志”。碑文楷书，15 行，满行 38 字，共 464 字。碑青石石质，品相完整，字迹清晰。此一通碑分别两面镌刻了“六品銜辽州十八盘分司沈某，辽州直隶州正堂周某”对一民事纠纷案的审判告示，并于告示中明言“发去告示，立即张贴，并刻石存照至该村社规……着即遵照办理毋违，特示”。“告示碑”充分体现了清政府的司法制度，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左权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民国年间的碑碣石刻以反映左权人民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内容为多。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 师司令部等百余党政军单位相继驻扎于此，一代民族精英，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华北乃至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这里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华北抗战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抗日名将左权将军在对日作战中，殉国于县境麻田十字岭，在为纪念将军而易县名的大地上，耸立起一座充满太行浩气的丰碑。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左权这个仅七万人口的小县，万余赤子参军参战，五千余众为国捐躯。现存于左权县烈士陵园的《左权同志碑记》、《朱德吊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作战战死于清漳河畔》、《叶剑英〈满江红〉一九四二年七七悼左权同志》、《创建烈士祠碑记》、《建烈士塔记》、《左权县八年抗战始末记》、《左权县八年抗战党政军民殉国烈士英名录》；现存于麻田镇十字岭左权将军纪念亭内的《建亭碑志缅怀左权将军》、周恩来《左权同志精神不死》、邓小平、刘伯承《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现存于麻田镇西山村的《新闻烈士纪念碑》；现存于桐峪镇桐滩村的《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现存于原辽县抗日政府驻地芹泉镇西黄漳村的《左权将军纪念碑》；现存于拐儿镇赵垴村的《八路军无名烈士碑》；现存于桐峪镇上武村的《殉国先烈战绩碑》等等，数以百计的碑碣从不同的角度记载了这波澜壮阔的血与火岁月，给后人留下沉重的赤色记忆和无尽的启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境内碑碣石刻，多展现了左权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强不息，不避艰辛，不畏强暴，不惧邪恶，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创造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谱写绚丽多彩历史篇章的万千景象。现存于左权县拐儿镇老井村的《石玉蛟引水工程纪念碑》、《〈老井〉电影拍摄纪念碑》生动地刻画了老区人民感天动地的壮烈场景。现存于芹泉镇漳漕村的《龙王庙掘机井碑记》，现存于羊角乡盘垴村高黄线盘垴段的《黄泽关筑路碑记》，现存于龙泉乡国家森林公园的《龙泉国家森林公园初创纪念碑》，现存于石匣乡下蛟村的《下蛟村修路铺街碑记》诸碑碣石刻，从多方面表现了左权人民为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福生活而奋斗的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境内碑碣石刻以内容分，有庙、寺、观、仓、宅、塔、坛、台、舞台、楼阁、桥、井、渠、泉、洞、山、河、树、衙署、府第、石窟、书院、城墙、道路、隧道、石阶、村庄、城镇、寨、堡等历代各类建筑及自然或人文景观所附属的创修、增修、扩修、重修、抢修、塑像、造像、雕像、妆金等纪事、施缘、题匾、题名、题联、题景、记游、诗文、记时等碑碣；有官府、官员等敕文、牒文、法令、训令、座右铭、手书、诗文、法书等碑碣；有历代名人神道碑、功德碑、墓表、墓志等碑碣；有宗教经文碑；有平面镌刻图画碑；有各种乡规民约、契约碑；有天灾人祸纪事碑；有公共事业纪事碑；有名人手书、诗文及书法绘画碑；有分界碑；有革命烈士及事件纪念碑。如此丰富之内容，皆在本书得以展示。

岁久代湮，境内佚碑数量较多，翻检有关金石著述、方志、古籍等，粗略统计约有《晋先轸庙记》、《重修文庙碑记》等 20 余通碑散落无踪，有待于今后探访寻查。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石刻碑碣是文物中文化信息较为丰富的实物遗存，石刻碑碣中保存的资料是真实可信的，是研究地域文化的重要实物，可弥补和印证文史方志之史实。保护石刻碑碣，是一项艰巨而困难的事业，应多视角、多部门、多学科共同努力，结合石刻碑碣文物的自身特点，或建设陈列室，或设立碑林，让这些鲜为人知而又具有人文魅力、艺术鉴赏价值的展品，走出书本，走出山坡洞穴、走出文物库房，呈现在群众面前，让人们在欣赏历史实物的同时，获得知识，陶冶情操。

《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左权县卷》编委会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杨二怀
序二	王 兵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北魏·唐·宋·元

北魏造像碑(正光六年)	(五)
大唐乐平郡张君墓志铭并序(天宝五年)	(七)
宋赵公墓志铭(元祐三年)	(八)
摩崖题记(宣和元年)	(一〇)
宋代造像碑(宋代,960—1127)	(一一)
掌山昭懿圣母庙记(元统二年)	(一二)
古箕许氏创修莹原记(至正四年)	(一四)
重修儒学宫记碑(至正九年)	(一六)

●明

新修十八盘并天井郊城堡图碑(洪武二十年)	(一九)
重修瓮洪山资寿禅寺记(正统十四年)	(二〇)
重建寿圣寺碑记(景泰三年)	(二二)
赠山西辽州贰守王公遗爱碑(景泰三年)	(二三)
辽州黄章里新店村重修石佛禅寺记(景泰六年)	(二五)
重修寿圣寺记(成化三年)	(二六)
重修紫微观记(成化四年)	(二七)
重建圣泉寺记(成化十五年)	(二九)
重修普照寺记(成化十五年)	(三一)
重修福圣寺记(成化十六年)	(三三)
重修紫微观记(成化二十二年)	(三五)
重修涌泉寺碑记(弘治二年)	(三七)
重修掌山昭懿圣母庙记(弘治五年)	(三八)
重修武军山寿圣寺功德记(弘治六年)	(四〇)
重修南殿记(弘治七年)	(四二)
重修圣泉寺记(弘治十年)	(四三)
广能禅师墓碑(弘治十八年)	(四四)
达摩祖师像(弘治年间)	(四五)

重修伍全山龙□古庙灵应记(正德三年)	(四六)
辽州重修福圣寺记(正德四年)	(四八)
重建甘露寺记(正德五年)	(四九)
续造藏经文记(正德八年)	(五〇)
重修普兴寺碑记(嘉靖二年)	(五二)
天门寺重修记(嘉靖四年)	(五四)
重修越台殿宇记(嘉靖六年)	(五六)
重修娲媼圣母庙记(嘉靖十年)	(五七)
重修龙天土地庙记(嘉靖十六年)	(五八)
重修资寿寺记(嘉靖二十一年)	(五九)
“飞磴盘云”匾(嘉靖二十二年)	(六一)
重修观音堂记(嘉靖二十五年)	(六二)
重修紫微观记(嘉靖四十一年)	(六四)
节次重修寿圣寺记(嘉靖四十三年)	(六六)
□修三泉寺记(万历六年)	(六七)
重修瓮洪山资寿寺殿宇记(万历十年)	(六八)
新建交口禅房村东桥记(万历十四年)	(六九)
重修天门寺记(万历十六年)	(七一)
新修山路记(万历十七年)	(七三)
重修圣泉寺碑记(万历十八年)	(七五)
重修观音堂记(万历二十一年)	(七六)
重修观音堂记(万历二十一年)	(七八)
紫微观重修南殿记(万历二十一年)	(七九)
重修寿圣寺碑记(万历二十三年)	(八一)
重修五台寺记(万历二十三年)	(八三)
增修寿圣寺记(万历二十五年)	(八三)
泰山显应山西辽州长城里川口村建立歇马行宫记(万历二十八年)	(八四)
重修照懿圣母庙记(万历二十八年)	(八五)
明文林郎广平府鸡泽县知县刘公合葬墓志铭(万历三十一年)	(八六)
重修圣母庙碑记(万历三十四年)	(八八)
辽州黄泽关重修义勇武安王庙工竣记(万历三十四年)	(八九)
重修徒履天仙圣母碧霞元君祠记(万历三十七年)	(九〇)
重修圣泉寺记(万历四十二年)	(九一)
重修崇山圣母庙记(万历四十三年)	(九二)
改建崔府君庙碑(万历四十三年)	(九四)
改塑关圣帝君像记(万历四十四年)	(九五)
明杨公墓碑(万历四十七年)	(九六)
明承事郎卫辉府推官杨公合葬墓记(万历四十八年)	(九七)
重修本庙天花板记(天启三年)	(九八)
重修南堂补塑圣像大展院墙之碑记(天启三年)	(九九)
新建观音堂碑记序(天启七年)	(一〇〇)
王公墓碣叙并铭(崇祯二年)	(一〇一)
创建观音堂碑记(崇祯三年)	(一〇二)

重修藏经殿水陆殿记(崇禎三年)	(一〇三)
重修观音碑记(崇禎八年)	(一〇五)
重修甘露寺碑志(崇禎十七年)	(一〇六)
●清	
重修庙记(顺治二年)	(一〇九)
重修圣泉寺碑记(顺治九年)	(一一〇)
重修普照禅林碑记(顺治十八年)	(一一一)
石台头村净业庵增修殿宇廊庑门楼墙垣功勳落成碑铭(顺治年间)	(一一三)
重修圣泉寺碑记(康熙十九年)	(一一五)
创修三教堂碑记(康熙二十四年)	(一一七)
重修丈八石佛碑记(康熙二十四年)	(一一八)
重修龙王庙碑记(康熙二十八年)	(一一九)
重修瓮洪山资寿寺碑记(康熙三十三年)	(一二〇)
创建戏楼碑记(康熙三十八年)	(一二一)
重修碑记(康熙四十六年)	(一二二)
创建龙窑梵刹碑记(康熙四十六年)	(一二三)
重修五台寺碑记(康熙四十七年)	(一二四)
重修五金山龙神庙碑记(康熙四十八年)	(一二五)
西云山三圣堂创建云楼阁碑记(康熙四十九年)	(一二六)
创修九江口南楼碑记(康熙五十四年)	(一二八)
重修圣泉寺碑记(雍正元年)	(一二九)
重修三泉寺记(雍正二年)	(一三一)
重修观音玄真阁碑记(雍正二年)	(一三二)
重修殿宇金妆佛像碑记(雍正四年)	(一三三)
五里背长条湾貳处地契碑记(雍正四年)	(一三四)
创修娲皇列圣祠碑记(雍正十一年)	(一三五)
观音堂增修卷棚碑记(雍正十二年)	(一三六)
重修寿圣寺碑(乾隆二年)	(一三七)
重修紫微观碑记(乾隆三年)	(一三八)
重修观音堂碑记(乾隆六年)	(一三九)
创修东岳庙戏台碑记(乾隆十年)	(一四〇)
高司马墓碑(乾隆十年)	(一四一)
重修钟鼓楼碑记(乾隆十年)	(一四二)
重修显圣庵碑记(乾隆十五年)	(一四四)
创修观音堂碑序(乾隆十八年)	(一四五)
重修观音堂记(乾隆十九年)	(一四六)
重修九江圣母庙记(乾隆二十一年)	(一四七)
重修碑记(乾隆二十二年)	(一四八)
重修甘露寺碑记(乾隆二十九年)	(一四九)
重修白衣阁序(乾隆三十一年)	(一五〇)
寿圣寺重修碑记(乾隆三十二年)	(一五一)
重绘庙内等项碑记(乾隆三十五年)	(一五二)
创建地藏菩萨石窑碑记(乾隆三十九年)	(一五三)

重修真武阁碑记(乾隆三十九年)	(一五五)
重修青云寺碑记(乾隆四十一年)	(一五六)
重修福圣寺碑记(乾隆四十一年)	(一五七)
移修圣母祠碑记(乾隆四十二年)	(一五八)
本村施舍地亩碑记(乾隆四十三年)	(一五九)
施地碑记(乾隆四十四年)	(一六〇)
重修观音堂碑记(乾隆四十六年)	(一六一)
重修碑记(乾隆四十八年)	(一六二)
新建寿塔序(乾隆四十八年)	(一六三)
重修三官龙天土地五道庙并戏楼雕塑金妆神像碑记(乾隆四十八年)	(一六四)
创建关圣帝君庙碑记(乾隆五十二年)	(一六五)
补修牛马王庙碑记(乾隆五十三年)	(一六六)
重修南堂石堰碑记(乾隆五十三年)	(一六七)
“佛景寺”匾(乾隆五十六年)	(一六八)
重修荣华寺碑记(乾隆六十年)	(一六九)
重修庙宇碑记(嘉庆四年)	(一七〇)
重修箕岗庙碑志(嘉庆五年)	(一七一)
重修观音堂碑记(嘉庆五年)	(一七二)
重修碑记(嘉庆五年)	(一七四)
重修改建菩萨寺碑记(嘉庆九年)	(一七五)
重修甘露寺碑记(嘉庆九年)	(一七七)
论定寨濠地铭记(嘉庆十年)	(一七八)
重修关帝庙碑记(嘉庆十四年)	(一七九)
重修崇山庙正殿两廊创立别院碑记(嘉庆十四年)	(一八〇)
重修龙王庙碑记(嘉庆十五年)	(一八二)
寿圣寺增修碑记(嘉庆十八年)	(一八三)
创修东阁碑序(嘉庆十九年)	(一八五)
甘露寺重经修理补葺碑记(嘉庆十九年)	(一八六)
重修白衣菩萨阁记(嘉庆二十一年)	(一八七)
重修泰山行祠记(嘉庆二十一年)	(一八八)
创修碑记(嘉庆二十三年)	(一八九)
重建南堂碑记(嘉庆二十四年)	(一九〇)
重修观音堂碑记(道光元年)	(一九一)
重修西五指村社房碑记(道光元年)	(一九二)
重修紫微观碑记(道光二年)	(一九三)
创建圣母龙神庙碑记(道光二年)	(一九四)
重修龙王庙碑记(道光二年)	(一九五)
重修关帝庙碑记(道光四年)	(一九六)
创修戏台碑记(道光五年)	(一九七)
重修关帝庙十八盘转□□碑记(道光六年)	(一九八)
重修关帝庙碑序(道光七年)	(一九九)
重修关帝庙观音阁碑叙(道光八年)	(二〇〇)
重修龙窑碑记(道光九年)	(二〇一)

重修碑记(道光九年)	(二〇二)
重修昭懿圣母庙碑记(道光十年)	(二〇三)
创修井泉碑记(道光十年)	(二〇四)
重修碑记(道光十一年)	(二〇五)
重修牛马王庙碑记(道光十一年)	(二〇六)
重修关帝庙前戏台碑记(道光十一年)	(二〇七)
重修碑记(道光十五年)	(二〇八)
重修观音阁碑记(道光十五年)	(二〇九)
补修箕岗庙并戏楼碑序(道光十七年)	(二一〇)
重修龙王庙碑记(道光十八年)	(二一一)
重修五台寺碑记(道光二十年)	(二一二)
重修三泉寺碑记(道光二十年)	(二一三)
重修碑记(道光二十一年)	(二一五)
重修真武庙碑文(道光二十二年)	(二一六)
创修文昌阁碑记(道光二十二年)	(二一七)
重修天门寺碑序(道光二十二年)	(二一九)
移修碑记(道光二十三年)	(二二〇)
菩萨寺重修碑记(道光二十三年)	(二二一)
重修观音重阁碑记(道光二十三年)	(二二二)
卖房契约(道光二十三年)	(二二三)
重修观音庙碑记(道光二十三年)	(二二四)
重修关圣庙观音阁碑记(道光二十四年)	(二二五)
重修观音堂碑记(道光二十四年)	(二二六)
重修龙神正殿乐楼并东西两廊碑记(道光二十五年)	(二二七)
重修香山庙西山隈水草大王牛马王庙碑记(道光二十五年)	(二二八)
重修观音阁创建拜殿碑序(道光二十八年)	(二二九)
重建菩萨真武阁碑记(道光二十八年)	(二三〇)
重修社房戏台碑记(道光二十九年)	(二三一)
重修庙碑记(道光三十年)	(二三二)
增修社房碑记(道光三十年)	(二三三)
补修老君庙观音阁碑记(咸丰三年)	(二三四)
重修关帝庙碑记(咸丰五年)	(二三五)
重修关房庙碑记(咸丰五年)	(二三六)
重修普圣宫碑记(咸丰七年)	(二三七)
西会修道碑记(咸丰十年)	(二三八)
重修关帝庙记(咸丰十一年)	(二三九)
重修府君庙碑记(同治元年)	(二四〇)
重修寿圣寺碑记(同治元年)	(二四一)
重修魁星阁并建北房四楹珉记(同治三年)	(二四二)
重修紫微观碑记(同治四年)	(二四三)
舍山碑记(同治七年)	(二四四)
重修观音堂碑记(同治九年)	(二四五)
重修山神庙碑记(同治十年)	(二四六)